

知识分子

历史与未来

許倬雲

讲演录

九江学院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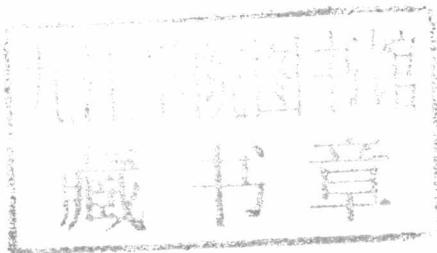
1447197

1808107

知识分子
历史与未来

許倬雲
讲演录

不外借



D663.5/
22060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授权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分子：历史与未来：许倬云台大讲演录 / 许倬云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9
ISBN 978-7-5495-0696-5
Ⅰ. ①知… Ⅱ. ①许… Ⅲ. ①知识分子－研究－中国－文集
Ⅳ. ①D663.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50382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莱芜市嬴牟西大街28号 邮政编码：271100

开本：965mm×670mm 1/16

印张：12.75 字数：156千字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2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本书是我在台大讲演集的大陆版，原书是2006年我访问台大时的两次讲演，加上和同学们的一些讨论，书名是《傅钟回响》，由台大出版中心在2008年出版。我是台大的毕业生，曾经在母校服务过一段时候，后来也多次访问母校。2006年的访问，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回到母校。因此，也可以算是我对母校能稍尽绵力的最后一回。过去访问台大，都是正式开课。这一次访问，经过历史系吴展良主任的安排，却稍微有一点特别：在历史系开课，修习的学生都是研究生；而且除了在讲堂上同学作报告、我加以评论外，下午还另和同学有单独的谈话。在这一学期，实际上我从同学们那里受到的启发，还多于我给他们的协助。甚至可以说，开了一学期课以后，我又一次从母校获得不少进益。为此，我向母校以及吴展良教授和选课的许多同学，致以谢忱。

那两次讲演，一次是讲知识分子目前和未来的角色，另一次讲多种多样的现代性，其实都是有感而发。中国长久有学者关怀社会的传统，在过去时代，学者们是士大夫，后来就成为知识分子，

或者“知识人”，这些以追寻知识为志业的学者们，曾经发踪指使，也曾经针砭批判；无论书呆子的意见是否适当，至少他们的用心是为社会作一个理性的指引和纠正。在近代，知识愈来愈专业化，知识可以转化为权力甚至金钱。知识分子变成专业人士，他们个人的收益可能相当可观。但是他们往往失去了独立的立场，为政权、为企业服务，而不是为了社会。现在，科技昌明，知识的作用，影响人生既深又广。如果知识分子不具社会良心，只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发挥知识的潜能，他们就成为科技世界内的新“婆罗门”。那篇讲演，我正是为台湾学界已经呈现这个趋向而忧心忡忡。

另一篇讲演，是有关“现代”的多种多样性。近百年来，中国努力摆脱传统，走向现代，可是，“现代”两个字的含义，似乎都是代表西方文明在近几百年的发展方向；走向现代，几乎就是西方化的同义词。我在这篇讲演中，也特别指明，西方近几百年来发展方向，有其历史特定性；世界各处承受西方压力及因此发生的响应，也有其历史特定性。天下没有真正所谓“现代”，“现代”时时在改变。甚至于也没有特定的西方，因为西方也是一直在改变。如果我们不认清这个问题的内涵，我们将永远赶在人家已经走过的路后面，当人家转方向时，我们还在原路追赶。这一危机，近百年来，中国似乎一直视而不见，近六十年来，海峡两岸种种做法，

也脱不开这个盲点。

以上两个讲演，是历史问题，但也是未来的问题。我们如果不认识过去和目前，我们将一直在蒙着眼睛走瞎路，知识分子如果不担起社会良心的责任，则这种新“婆罗门”，对社会的进步和预防社会发展的错失，都将无所贡献。

本书后半段，每一节都是和某一位研究生研究课题有关系。因此，各节之间看上去相当散乱，彼此并无关联。可是，文化系统是一个整体，政治、经济、法律和意识形态，种种面相，其实彼此相关；同学们提出的问题，都是种种面相中的一面和一片。有心的读者，大概可以发现，在我的回答中，其实每一段都可以和另一段连接在一起看。人文和社会学科的研究，不容分割为互不相连的学门，如果各科之间互不相干，我们的努力永远只是盲人扪象，抓到了鼻子、抓到了腿，可是抓不到大象的整体。只有理会到，鼻子也是大象的一部分，大腿也是大象的一部分，象肚和象尾也是大象的一部分，我们个别的努力，才可能联系成为一个整体的理解。

我进入台大读书时，只有十九岁，今天我是八十岁了。回顾整整一个甲子，当年一切，师生际遇，许多细节，宛然在目。尤其怀念到当年的老校长傅孟真先生，他虽然只担任两年校长，但

他对台大的贡献，后人无与伦比。他尽心尽力为学术、为社会正义、也为了教育青年学子，呕心沥血，在五十四岁的壮年，劳累气恼，就撒手而去。很少有人在短短的五十四年内，能如他一样，替社会、国家做了这么多的事。最重要的，傅先生树立了知识分子的典型；曾经在一次全校作文比赛上，他出的题目是：“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傅先生的一生，确实是做到了死而后已。台大校园有个傅钟，正在文学院的面前，是为了纪念傅先生而建。我们在那钟声下长大，我一生工作，也时时不忘傅钟代表的激励，原书书名《傅钟回响》，正是表达了我的心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改换了书名，我也理解，大陆上的读者，不明白“傅钟”两个字对我们的意义，可是我必须在此说明，以表达我自己对老校长的怀念和感激。

许倬云

2011 年 3 月

2006年10月至12月间，许倬云先生以特聘讲座教授身份，为台大历史系开授“中国文化教研专题讨论”课程，并在台大做了两次公开演讲。这本讲学集，就是许先生九次上课及两次公开演讲内容的集结。

许倬云先生，1930年生于厦门，祖籍江苏无锡，1948年来台，1949年考上台大，与台大的渊源很深。很多人不知道许先生刚进台大时，报考的是外文系，大二才转入历史系。当时傅斯年校长及文学院院长暨历史系教授沈刚伯先生早就注意到他中国通史和西洋通史的成绩都很好，并说了“早就该转历史系”这句话。许先生后于1953年获学士学位，并考入台大文科研究所史学部，即今台大历史学研究所的前身。1956年毕业，硕士论文写的是《古代中国的天与帝》，指导教授为李玄伯（宗侗）老师。同年，许先生进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翌年，承时任台大校长的钱思亮先生及胡适先生多方奔走及协助，顺利获得徐铭信先生留美奖学金，负笈至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深造，

于 1962 年获人文科学博士。旋归本系任教，并于 1964—1970 年间以教授兼系主任引进社会科学治史的新方法，并推动了许多重要的改革。

1967 年 9 月，在许先生系主任任内，台大历史学研究所正式成立博士班，这也是台湾的大学中第一个成立的历史学博士班，堪称培育历史研究及教学人才的摇篮。1970 年 8 月，许先生因故辞系主任一职，远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执教，直到 1999 年荣退，转任校聘讲座教授。其间并于 1980 年荣膺“中研院”院士，另曾于 1984—1985 年间获聘为本系讲座教授。

许先生学贯中西，以中国古代史及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享誉史学界。基于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许先生对历史知识的普及不遗余力，并常评论时事与文化议题，文字间不断流露出对于国家社会与人类文化的关怀之情。

许先生自匹兹堡大学退休后，虽曾受邀至各处讲学，却极少在台湾开课。2006 年，在蒋教务长丙煌、黄教授俊杰与敝人的共同努力下，力邀许先生回校讲学。除了让年轻学子得以亲炙大师风采，也希望在他的指引下，使同学对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有深一层的认识与反省。校方原本计划邀请许先生大班授课，但许先生以体力因素婉拒，改授研究所课程。2006 学年度第一学期，校方

以特聘讲座教授致聘，许先生回到历史系开授“中国文化教研专题讨论”课程。

这门课程的修课对象，设定在对“历史与人文”领域有兴趣之硕、博士班研究生，不限文史科系。上课主要以专题讨论及个别指导之方式进行，修课人数只限十二人，后来加上外系及外校的旁听生，共有十八人听课。我自己也“随班上课”，协助许先生处理一些行政事务，并与学生一同瞻仰大师风采。

上课时间自 2006 年 10 月 3 日至 12 月 19 日，地点在设有无障碍设施的“国家发展研究所”，每周二上课，前后九次。第一堂由许先生概要介绍中国文化的核心要素及上课方式，第二堂开始由修课学生自订主题，撰写报告后分组宣读，许先生再加以评论，并开放同学提问及讨论。最特别的是，许先生要求当天报告的同学预留下午的时间，以便单独和该组同学进行深度对谈，形式不拘，主题亦不限于学术。以许先生的体力状况，主动提出要和学生“聊天”，机会着实难得；加上许先生为人亲和，对谈时如沐春风，内容又包罗万象，很多同学深觉受益匪浅，受到的启发和提示，与课堂评论截然不同，诚可谓“与公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许先生当初未考虑以其专业领域“中国古代史”开课，而以较为宏观的“中国文化”为主轴，进行专题讨论，目的在引导修

课同学对于历史事件做宏观的思考、判断、分析及归纳。而课后对谈，则是用一对一直接指导的方式，针对各人的特质，以期收到最大的效果。

在许先生回母校客座期间，台大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亦把握此难得机会，邀请他为该院主讲第一次人文讲座。时在 2006 年 11 月 29 日，于台大应用力学研究所国际会议厅举行，主题为“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及未来世界的知识分子”，由包副校长宗和亲自主持，众多师生齐聚一堂听讲，并踊跃提问。

许先生历来深切关怀当代社会文化之演变与发展，乃借用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对当代知识分子的期许及努力的目标。在知识已成为商品，掌握知识者即掌握权力来源的今日，许先生语重心长，希望大家坚持知识分子的良心，“愿意做傻瓜，承担痛苦，抗拒财富与权力诱惑”，以文化的承载者自我期许。

同年 11 月 30 日，校方另行举办一场小型论坛，主题为“多样的现代性”。许先生深入浅出地阐释何谓现代化，并自历史上的文化涵化及全球化等角度，说明现代性的多种面貌；人类社会正在彻底重组，我们不应只向过去看问题，应该把眼光放远，深思熟虑。

这本讲学集汇集了许先生九次上课和两次公开演讲的内容。在上课及演讲前，我们征得许先生同意，将每次上课内容全程录音，由几位修课同学合力整理出文字初稿，并提供课堂报告及摘要，送请许先生推荐的责任编辑汤世铸先生查证资料及润饰全文，最后请许先生亲自过目定稿。

许先生晚年已较少撰写考证研究与专题论文。至于一向视为副业的“为报纸写文章”，也有感于自己离年轻一代较远，恐出不合时代之论，而于 2005 年圣诞节后决定停写。他自己曾说，过了七十岁以后，凡是公开演讲，他都当作是最后一次，由此更显得这本讲学集的特殊与珍贵。我们希望这本集子的出版，可使历史研究者及一般社会大众，经由许先生的提点，得以较宏观且多面向地了解自己的文化与历史，培养面对未来世界的智慧。

本书编辑过程中，除邀请汤世铸先生负责整理文稿，又承及本系陈南之女士负责整体的编务，以及台大历史系多位研究生担任誊写录音稿的工作，在此一并致上深切的感谢。

台大历史系吴展良谨识

2008 年 4 月

目 录

- 演讲一 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及未来世界的知识分子 / 1
演讲二 多样的现代性 / 29

“中国文化教研专题讨论”课程

- 第一讲 困境与转机 / 47
第二讲 知识分子暨民族主义 / 63
第三讲 唐宋之变 / 79
第四讲 考古与上古史研究 / 95
第五讲 荀学暨道教 / 107
第六讲 情理与律法 / 117
第七讲 理学修身·儒医关怀 / 135
第八讲 精英地方化·五四运动 / 159
第九讲 斯文·死谏·同心圆世界观 / 173

演讲一

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及未来世界的知识分子^{*}

包（宗和）副校长、叶（德兰）教授、台大历史系的同仁及各位同学，包副校长介绍我时，我不免感慨。回头一想，我从台大历史系毕业五十三年，从硕士到现在也有五十年。1970年代，我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台湾到美国，因为当时有一股力量要把我们换掉，想想迄今已有三十多年了。如今，我每走过台大校园，常常感觉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以我今天七十七这个岁数，确实是要重新回想一下这辈子所做的事。

我一辈子做的事，就是读书与教书，想在知识这个非常宽大的海洋里，开拓自己的境界，整理已知的知识。数十年来，我始终在知识这个领域里挣扎，假如说“知识分子”是个志业的话，我可说终身投入了这个志业。我借今天这个机会，向母校的各位

* 本文为2006年11月29日于台湾大学应力所演讲厅讲演内容。

同学及师长，反省我自己的想法。讲题看来很啰唆，前半是谈以中国为主的历史，后半则是谈未来的展望及其相关的难题。

古代的知识分子：从“巫”到“士”

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指的就是中国常说的“读书人”，这种人不在具体的工具层面想问题，而是在原则与理论层面上想问题。

在新石器时代，就有这种人出现了。他们的原型（archetype）是巫和觋，“巫”是男巫，“觋”是女巫，简单说，都是通灵者。这些人除了打猎、捕鱼、采集果实、种植庄稼外，也许由于有特别的禀赋与志愿，他们会在观察之中钩玄提要，想到吃饱以外的事情，甚至自己也认为是通灵者。在人类文明初起阶段，世界各地几乎都可以发现这种人的存在。

巫和觋这些人慢慢转移分化，成为第一阶段的知识分子。像中国的“祝、宗、卜、史”，即是掌管祭祀、占卜、记录之人。祝、宗、卜、史，从巫、觋这个专业阶层分化而来，他们可能是世俗性的，也可能是属灵的。商代卜辞中的国王顾问——“贞人”，就有卜史的性质，一方面替国王解释占卜得来的答案，另一方面会对自然现象提出理论。商代的贞人们，既解释人事，也解释自然。他们用占卜的结果，集合许多应验或不应验的经验，因而提升了智慧。《易经》里的卦辞，部分可能是源自卜辞，兼有历史现象，如：“帝乙归妹”，是说帝乙把他的妹妹嫁掉了；“小狐汔济，濡其尾”，是说小狐狸过河，尾巴湿了。这是历史事实，也是自然现象。

我在《西周史》一书中，讨论过周代“史”这个职务的各种各样分工，包括：记录员、历史的编撰者、规劝政府，显示周代单单从保管文字记录的“史”，已分化成更多的细项。这些从事“史”职务的人，从历史往事与人事现象中，归纳出许多原则。这些原则，不是为了专业实际的工具性，而是为了提升智慧的水平。他们从历史中找到一些道理，找出哪些政治现象会引发哪些后果。“史”这些人在《左传》中有史墨、史朝等，他们从知识中勾勒出许多智慧，做的已经远远超过专业技术性工作。这些提升知识到智慧的人物，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知识分子。

我并不是说古代史官都是这样，能够做到这部分的也不过就是少数几个人。换言之，史官也罢，占卜之人也罢，都会从实际现象中钩玄提要，把问题提升到一般的通则，作为大家思考的提示。聪明的人，常是在灾害没有出现以前就提出警告；笨的人，当灾害来临时还不相信警告者所说的话。学历史的人其实很悲苦，永远说些人家不爱听的话，几千年下来一直到今天亦复如此。

以上是中国的情形。世界上其他地区有没有类似的情况？事实上，重要的文明系统中都有类似情况。犹太教中有几类人有专业的意义，如《圣经》中称之为“法利赛人”(Pharisees)、“利未人”(Levite)者，前者是律法师，后者是礼节师。这两个字的中文翻译，不应加“人”，加了“人”变成族群了。另外还有些人被称为“先知”(prophet)。伊斯兰教系统中的乌拉玛(Ulama)，可称为“教士”、“教师”，权力很大，管理人生、指导政治、订出礼俗与法律。还有，印度教中的婆罗门(Brahmana，指印度的祭师)，以及基督教、天主教系统中的天主教神父、基督教牧师、东正教僧侣等亦然。表

面上，这些人的性质，都跟刚刚谈到的知识分子类似，但他们和政权的关系，和社会其他人的关系，在其各自的文明系统中都不太一样。也就是说，各个不同文明系统中的这些知识分子，有着类似的身份与角色，但他们在社会与政治相对关系的实际光谱上，却有着不同的位置，不能一概而论。今天的演讲，因限定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细谈其他的文明。

接下来的春秋时代，礼坏乐崩，封建制度倒下，很多知识分子从“王官”被释放出来。当时，亡了一国，就有一批公务人员被释放出来；一个贵族的领地被占领，这个贵族的家属被灭掉，但贵族手下一大批祝、宗、卜、史会被释放出来。孔子（552—479B.C.）是其中之一，他本身虽没担任过祝、宗、卜、史这类职务，但他从许多掌握知识的人学到许多学问，成为当时著名的大学问家。孔子的弟子、同事，有很多是直接、间接从专业工作中被释放出来的人。这些人已不具备公务人员身份，不再由官方供养，为了重新获得长久扮演的角色，他们游离待雇，进而向世人提示所知所闻，警世告人。从春秋开始一直到秦汉，这些游离的知识分子，我们称他们为“士”。

知识分子的四种类型

北宋的张载（1020—1077），与王安石（1021—1086）同时代，他曾说过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四句话可以说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期许，同时也是中国知